



中国历代改革家的 命运与反思

历史是一面镜子。如果不研究历代的经济变革，其实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中国改革。本书选取中国历史上具有典型意义的七位改革者——管仲、商鞅、赵武灵王、桑弘羊、王莽、王安石、张居正在改革实践中的兴衰得失，对改革变法进行了深刻而形象的剖析。他们推进改革艰苦卓绝的实践、坎坷跌宕的个人命运，将成为我们今日改革，古为今用知往开来的一面镜鉴。

陈为人◎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014033662

K827
2080

陈为人◎著

中国历代改革家的
命运与反思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北航

C1721782

k827
208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改革家的命运与反思 / 陈为人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378-4046-0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政治家-人物研究-中
国 IV. ①K8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1353号

书 名 中国历代改革家的命运与反思
著 者 陈为人
责任编辑 陈 洋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太原发行部)
010-84364428(北京发行中心)
0351-5628688(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010-84364428
网 址 <http://www.bwyw.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7
字 数 190千字
印 数 1-5000册
版 次 2014年3月山西第1版
印 次 2014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046-0
定 价 48.00元

序

徐庆全

读完陈为人大兄的这部大作，时间很长了，但对于他所要求的序言，则迟迟不好下笔。那缘由，不是为人兄的作品写得不好——作为著名作家和评论家，他驾驭文字的能力，他作品的架构，在当下都是上乘的，读起来如饮甘饴，畅快淋漓——而是他所涉及到的题材。

为人兄这部书，写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或者改革家的命运，但具体指向则在在与现实相关；而我，对把中国历史上的事往现实上扯却不太赞成。

不好下笔，为难之“难”，此为之一。

有人说，我们都生活在历史的延长线上，这话不错；但是，现实当中，但凡把历史往现实生活扯的，还能扯得有意思，采用的手法都是用历史说事。这种手法，目的不是继续将历史的延长线延长，还是章学诚叙史的路数——“史学，所以经世也”，依然是什么“以史为鉴”“资政育人”之类的闲篇。这种手法，用历史记忆中的一个词来说，那就是早就被人诟病过的“影射史学”。这也是当下“历史热”中相当普遍的一种现象。

大概千禧年之后,有关古代历史的话题突然热起来了,到今天仍然如火如荼。坊间常能见到大秦王朝或大明王朝“那些事”或“面孔”,“主旋律”的《百家讲坛》、“说三国”“说论语”等等,都是这种历史热的表象。

若透过表象看本质,我认为,一个社会中,如果历史图书,尤其是古代历史而不是当代历史图书,突然流行,大致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同样,一个作家,一个评论家,如果不能直击时弊,仍然需要躲在历史帷幕中对现实说长道短,也是这个社会畸形的一种表现。

用历史说事,基本上等同于“影射史学”。而影射史学是什么?余英时说:“影射史学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政治现实和理论中”,其“思想根源在于古为今用的观念,……为短期的政治目标服务的动机,促使史学家直接选择有用的事实,不可避免地会将历史的学问转变为政治的宣传。”

对于这种政治宣传,经历过“文革”或对“文革”历史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那是“影射史学”达到极致的年代,余英时所指出的种种现象都为我们所熟知:孔子先是与周恩来挂钩,接着是邓小平,最后是华国锋。秦始皇与毛泽东,汉代的吕后和唐代的武则天与江青,法家与“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儒家与部分老一辈革命家,也都划上了等号。

“文革”后,“影射史学”遭到人们的诟病,但在当下的“历史热”中,却有死灰复燃的迹象,只不过话语主体有了转换:彼时是党内部派别之争的政治武器,此时成为一般读者从历史获得对现

实阅读的“期待视野”——这是接受美学宗师姚斯所提出的概念，也成为像陈为人兄一样的作家、评论家抨击时弊的保护伞。对此，为人兄并不讳言。他在开篇“引言”中就说：“那位说过‘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还有一句类似名言：‘史家对以往史实的兴趣，永远与他对当前生活的兴趣连成一体。’那位写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法国托克维尔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我们如果不研究中国历代的经济变革，不了解古代历史上改革变法者的命运，其实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当前改革的现实。我们穿越时空的隧道，重构历代改革变法者们的原貌，无疑有着‘古为今用’的镜鉴功效。”

人们常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这话不错。但如果把读历史、写历史作为现实阅读的“期待视野”，仅仅局限在史为镜、知兴替的范围；把用历史说事当作写作的话头，而不是出于一种文化需求，显然并不是好事。这至少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文化有些非常态。

不过，话再反过来说，也正因为这样的非常态，为人兄这本大作才写得很欢实，我相信，出版后极有可能畅销。因为现实社会中有阅读的“期待视野”，读者群不缺；为人兄是名作家，抛开他大手笔的叙事和文采飞扬的基本功不说，但就以往的读者“粉丝”，基本的开印数就有了。所以，谁还会在意我说的是什么呢？

不好下笔，为难之“难”之二是，在我看来，把中国历史上的或

“改制”或“变法”或“新政”，用“改革”来一以贯之，基本上是“后设叙事”。所谓“后设叙事”，就个人来说，是以今日之我诠释昔日之我；就历史来说，是以现实作参照的历史叙事，用为人兄的话来说是“重构”。不管是诠释还是重构，“后设”自然不可避免。在我，对这种“后设叙事”是有着戒心的。

把中国历史上的或“改制”或“变法”或“新政”，用“改革”来命名，不是为人兄的发明，早在三十年前就有学者这样说了。

在我的印象中，最早把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现实改革联系起来的，是党史专家胡华。现在，不管是史学界还是公众界，都淡忘了这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人。在当年，他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在学子们心中，他甚至和胡绳都有得一拼。

大概是1983年，胡华在一个场合做过一个报告，从历史上的改革看中国当前的体制改革，强调的是在同一社会制度中的“革命的改良”。所谓“同一社会制度”，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整篇报告洋洋洒洒的，从外国历史上的改革，到中国历史上的改革，再到当下现实中的改革，论证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1978年以来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改革。

我很清晰地记得胡华这篇报告的内容，是因为这篇报告被作为一份学习材料散发过。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转过年来的1984年初，我们发的学习材料，一份是胡乔木的《人道主义与异化》，一份就是胡华的这份大报告。只不过这两份材料待遇差大了：胡乔木的文章是正式出版物，很规整；胡华的文章是活字印

刷的，纸张有些黑，也比较糙，订书机装订，一点都不正规——今天，我想方设法搜寻胡华的文章，还真找到了，文章发表在1984年12月出刊的《河北学刊》上。

胡华论述的要点是，1978年来正在进行的改革，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在他去世前后（他1987年12月去世），十三大报告就说，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时，胡华已在病中，没有能力再去论证我们所处的“初级阶段”；他若地下有知，还应该知道我们现在的提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见，“后设叙事”的研究无论如何总会有赶不上潮流与大势的尴尬。

但不管怎么说，当年胡华是有号召力的。有胡华的号召，史学界开始有人把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现实改革挂上钩。1983年9月，福建省历史学会福州分会和福建师大联合举行“历史上改革问题讨论会”，正式把历史上的不论是“改制”还是“变法”，统统归到“改革”这个词下。不过，那几年，虽然有关于历史上的改革的文章，但声势不大，文章篇幅也不多。

1991年，中央党校联络各地党校的历史教师，编辑一本《中外近代历史上的改革》，在当年反响比较大。这本书为什么影响大，其实还是因为和现实相关。1991年，中国的改革有些停滞，各种政治教育运动取代了来自基层的改革潮涌；“反和平演变”培训班之类的做法，近乎淹没了各界对改革的呼声。我猜想，那几位老师牵头编一本《中外近代历史上的改革》的书，大概也是对继续改革的一种呼吁吧，所以影响才大。不过，转过年来，邓小平南巡后，改革又如火如荼，这本书大概也就而已了。

“而已”的还不止这本书，还有 1997 年出版的《中国改革史（先秦—清末）》。这部大部头的书，是当年著名的宋史专家漆侠领衔主编的，装订也很精美，也被媒体喧嚣为“第一部中国改革通史”，但依然很“而已”。那时，我们的存量很多，改革也如火如荼，人们还顾不上拿着历史上的事来说事，“历史热”在后几年才能出现。这种“而已”的尴尬，是必须的。

在我个人看来，中国为什么会从 1978 年开始改革，用两句话可以概括。第一句话是：“走自己的路，让自己无路可走”。这可以概括我们改革的背景。1949 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也就是走自己的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几番探索与实验之后，老百姓依然吃不饱，国民经济依然上不去，最后的现实是自己也无路可走了，于是开始“摸着石头过河”。

第二句话是，“走别人的路，让自己有路可走”。这是说的我们改革的成功经验。1978 年开启的改革，是与“开放”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叫作“改革开放”。其实，按实际发生的情形看，叫作“开放改革”可能更贴切。在 1978 年 12 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开始大规模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这算是放眼看世界的开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当我们还在用阶级斗争捍卫主义，走自己的路的时候，邻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在一起走路，走得很快，比我们早走近二十年。所以，我们开始改革，也就是“开放搞活”，开始放弃走不通的“老路”，开始“走别人的路”。走着走着，我们自己就有路可走了。

可是，有些人却宁愿我们无路可走，也不愿意我们“走别人的

路,让自己有路可走”。于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关于走什么路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早期是所谓的姓“资”姓“社”的表述,现在是“老路”和“邪路”的说法。改革之难,常常不在改革之内,而在改革之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再说什么“路”,超越意识形态谋发展,“深化改革”才不是空话。如同当年我们“开放搞活”一样,不需要什么政治智慧,需要的是扎扎实实推开门窗看世界的勇气!

可是,很多人都知道,推动历史发展的“勇气”是不好寻觅的。为人兄是对社会敏感的作家,他想从历史上寻找一种借鉴,也就顺理成章。他在书中的引言开篇说:

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1992年1—2月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再次来到深圳特区,当然不是休养,是身负使命。1979年的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既是一种“开放”又是一个“限定”。自此而后,中国开始了改革的历程。然而,一路走来“筚路蓝缕”,几乎夭折。到1992年还需要“老船长”拨正船头重新起锚。如今又是二十年过去,也许从“经济”而言,硕果累累斩获颇丰。但由于两轮一轮之偏废,双翼一翼之夭折,盛世锦簇之下是险象环生。中国的改革又面临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荀子有言:“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跬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衢涂为十字路口,就是说,在十字路口,走错“跬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到时候就哭也来不及了。

为人兄这本书,说的是历史上改革的事,但着眼点在于在历

史上搞改革人的勇气，可谓说到了当下问题的实质。为人兄的激情、迫切感，也感染了我。一向对“后设叙事”持有戒心的我，很乐意看到为人兄这本书能够达到这一目的，和他一样希望这本书“成为我们今日改革古为今用知往开来的一面镜子”。

目 录

引言 IV

管仲经济腾飞中的“百慕大怪圈” 07

1. 盛世华庭下的累卵危局 09
2. 千古绝唱的管鲍交谊 12
3. 管仲所背负的道义十字架 16
4. 千古君臣难类此 20
5. 辉煌燃烧中并存的渣滓灰烬 26
6. “无烟工业”带来的社会污染 32
7. 由俭而奢是经济发展的“惯性”还是误区？ 36
8. 总也走不出的“百慕大怪圈” 43

商鞅变法的名实悖论 51

1. 阳讳其名，阴用其实 53
2. 理想主义遭遇实用主义 58
3. “目标崇高”与“不择手段” 65

目
录

4. 变法改革是某种意义上的“重新洗牌”	67
5. 大国崛起中释放的“潘多拉魔瓶”	71
前言	
赵武灵王的接班人悲歌	77
1. 晋代衣冠成古丘	79
2. 赵武灵王的闪亮登场	84
3. “胡服骑射”诞生于风起云涌之中	91
4. 手心手背都是肉，首鼠两端铸祸端	98
5. 赵武灵王与秦昭襄王的风云际会	104
6.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110
赵武灵王“封哥”的深意与公孙弘的浅见	
桑弘羊改革中经济与政治的纠结	115
1. 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117
2. 武帝朝中多商贾	120
3. 经济头脑遭遇道义灵魂的拷问	126
4. 《盐铁论》中折射出对桑弘羊的历史评价	133
5. 桑弘羊命运的拐点：轮台事件	142

6. 改革祭坛上的牺牲品	147
王莽新政的“授命说”拷问	
1. 一生真伪复谁知?	155
2.《汉书·王莽传》中透露出的真实历史信息	159
3.“天人感应”所隐喻的时代背景	163
4.“君命天授”确立的“执政合法性”	171
5. 马到悬崖勒缰迟	174
6.“授命说”是一把双刃剑	177
王安石变法的诡谲怪圈	
1.《辨奸论》描绘的王安石形象	187
2. 王安石早期诗文中所透露出的志向	191
3. 执政党很容易蜕变为保守派	197
4. 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在变法中的定位	201
5. 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即成谬误	206
6. 王安石变法留给历史的思索	211

张居正新政的官场黑厚	219
1. 名可名,道难道	221
2. 隐忍是官场的“绿色通道”	225
3. 没有志同道合的结盟,只有利害权衡的选择	230
4. 一个小媳妇与三个婆婆的改革	236
5. 好人未必成“好官”	244
6. 不当贪官也难	249

引言

2012年是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1992年1—2月间，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再次来到深圳特区，当然不是休养，是身负使命。1979年的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这既是一种“开放”又是一个“限定”。自此而后，中国开始了改革的历程。然而，一路走来“筚路蓝缕”，几乎夭折。到1992年还需要“老船长”拨正船头重新起锚。如今又是二十年过去，也许从“经济”而言，硕果累累斩获颇丰。但由于两轮一轮之偏废，双翼一翼之夭折，盛世锦簇之下是险象环生。中国的改革又面临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荀子有言：“杨朱哭衢涂曰：‘此夫过举跬步而觉跌千里者夫！’哀哭之。”衢涂为十字路口，就是说，在十字路口，走错“跬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到时候就哭也来不及了。

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败得失，近年来一直有着“崛起”与“崩溃”极端悖逆的两极化评价。一种认为，中国的经济崛起是一个伟大的奇迹。103岁高龄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恩，在《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一书中认为：起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转型是“历史上最为伟大的经济改革计划”，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哈耶克“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理论的一个极

吉 他

佳案例；另一种声音，因准确预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而盛名远扬的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中国经济正在走向崩溃。他的主要论据是，中国的居民消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百分之三十，经济的增长主要依赖的是廉价劳力产生的贸易顺差和出让土地形成的房地产泡沫。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法律现状、经济结构等问题将成为经济崩溃的原因。

那位说过“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还有一句类似名言：“史家对以往史实的兴趣，永远与他对当前生活的兴趣连成一体。”那位写出《旧制度与大革命》的法国托克维尔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只能考虑当代主题。实际上，公众感兴趣、我也感兴趣的只有我们时代的事。”我们如果不研究中国历代的经济变革，不了解古代历史上改革变法者的命运，其实无法真正理解中国当前改革的现实。我们穿越时空的隧道，重构历代改革变法者们的原貌，无疑有着“古为今用”的镜鉴功效。

林鹏先生对改革图强说过一番很深刻的话：“我发现霸业之兴，全靠田制税制的变法。而没有危机，决不肯变法，没有变法绝不能称霸。又因为变法不过就是‘狙公赋芻’，朝三暮四而已，所以没有持久的变法，自然也就没有持久的称霸。春秋的变法运动看上去很自然，道法自然，自然而然，只是事到其间，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完全不由人的主观意志。”“弱者思变”“积弱图强”，弱者永远是改革变法的发动机。林鹏先生洞若观火地指出了春秋战国时期五霸争雄的改革变法，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的形式之变，并不触及封建王朝的体制之弊端，所以，尽管有效然而也有